

敦  
煌  
學

敦煌學會編印

敦煌學研究中心  
第二十一輯

# STUDIES ON TUN-HUANG

VOLUME XXI

1. 敦煌學研究之回顧（一）	潘重規	1
2. 敦煌學研究之回顧（二）	潘重規	29
3. 敦煌學研究之回顧（三）	吳昌森	33
4. 敦煌學研究之回顧（四）	吳昌森	41
5. 敦煌學研究之回顧（五）	吳昌森	63
6. 敦煌學研究之回顧（六）	吳昌森	71
7. 敦煌學研究之回顧（七）	吳昌森	79
8. 敦煌學研究之回顧（八）	吳昌森	91
9. 敦煌學研究之回顧（九）	吳昌森	107

## 敦煌學研究中心

Association of the Studies on Tun-Huang

Taiwan R.O.C. 1998

# 從《金剛經》寫本特色淺談寫本斷代問題

何峰

## 一、前言

敦煌寫本的斷代工作是敦煌學學者努力不懈的研究課題之一，於是從語言學、古文字學、詞法學、文章格式、紙質分析等等角度進行分析的研究成果。例如將寫本文書特色結集成專文以為斷代參考的，有吳其昱先生的《敦煌漢文寫本概觀》<sup>2</sup>、林聰明先生的專書《敦煌文書學》<sup>3</sup>；針對寫本紙質大量進行分析的法國 Jean-pierr DREGE<sup>4</sup> 等等都是受人注目的成果。

由於流傳久遠，《金剛經》寫本之多使它在敦煌的諸多佛典寫本中佔有一個相當突顯的地位。但儘管歷來對此經寫本的研究已多不勝數，依筆者寡陋所見，似仍未有利用此經頗具時代個性之寫本特色作為考證寫本年代的的研究，筆者乃針對此點略作探記。然因所學尚淺，間有臆測之說，未可信為定論，不敢自矜有所創獲，此文僅承博洽君子不以為不可教誨而教誨之，實所深幸！

## 二、《金剛經》敦煌寫本特色及其時代個性

這個探討是從六<sup>5</sup>至十世紀的寫本中抽出 139 個具有明顯特色的做為基礎，

---

<sup>1</sup> 本研究承蒙蔣經國學術交流基金會贊助，謹此致謝。

<sup>2</sup> 吳其昱，《敦煌漢文寫本概觀》，敦煌漢文文獻，講座敦煌 5，東京：大東，1992，1-142 頁，頁 17-18。

<sup>3</sup> 林聰明，《敦煌文書學》，台北：新文豐，1991，453 頁。

<sup>4</sup> 例如 DR È GE Jean-pierre，《Papiers de Dunhuang---essai d'analyse morphologiq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atés》，T'ong Pao，Vol LXVII，3-5，1981，頁 305-360；《Etude formelle des manuscrits de Dunhuang conservés à Taipei：Datation et Authenticité》；《Notes codicologiques sur les manuscrits de Dunhuang et de Turfan》，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Orient，Vol LXXIV，1985，頁 477-504 等等。

<sup>5</sup> 這個註記 535 年的寫本是發現於鄯善，今藏於日本東京的書道博物館。據筆者搜集的資料顯示，似乎日本敦煌文物研究所資料室還藏有一個「首尾完具」且年代註記為建武四年(497)的寫本。若屬實，則後者應是現存年代最古的金剛經寫本。

整理得出各特色的發生時代，配合史實考證後，再用之於斷代。

首先，我們發現的特色主要有 11 個，分別分布在經文前 3 個，經文內 5 個，經文後 2 個及寫本形式 1 個。內容如下：

經文前……

1. 直言：a. 淨口業真言 b. 安土地真言<sup>6</sup>
2. a. 八金剛 b. 四菩薩
3. a. 云何梵<sup>7</sup> b. 發願文

經文內……

4. 譯本版本：a. T. 235 b. T. 236A c. T. 220
5. 分科：a. 32 b. 12
6. 加寫司偈六十字補遺段
7. 行文格式：a. 每行 17 字 b. 非每行 17 字
8. 「世」字避諱情況：a. 避諱 b. 不避諱

經文後……

9. 真言：a. 大身真言<sup>8</sup> b. 隨心真言 c. 心中真言<sup>9</sup>
10. 題跋：a. 校閱 b. 西川過家真印本 c. 八十餘歲老人記
11. 寫本形式<sup>10</sup>：a. 本子或冊子 b. 本版印刷本

若將這 11 個特色配合它們出現於寫本的年代表示，我們得到下面的統計表：

特色編號	第六世紀	第七世紀	第八世紀	第九世紀	第十世紀
1	/	/	/	a	a, ab
2	/	a?, b?	/	a, b	a
3	/	/	/	a	a, b
4	a <sup>11</sup>	a, b, c	a	a	a

<sup>6</sup> 另亦見到虛空藏菩薩普供養真言於 S.5646，金剛兒神咒與文殊菩薩心中真言於 P.2094-2。

<sup>7</sup> 又名「持經梵音」。

<sup>8</sup> 又名「金剛經陀羅尼神咒」、「發菩提心界咒」、「金剛心真言」。

<sup>9</sup> 又名「心中心真言」。

<sup>10</sup> 尚有卷軸式，於此我們但就形式特殊者言。

<sup>11</sup> 據智顛(531-597)和吉藏(547-622)的金剛經疏，大正藏 No.1698 及 1699，在他們的時代已流通菩提流支與真諦的譯本。

5	/	b 於 T236A	/	a 於 T. 235	a 於 T. 235
6	/	/	/	/	X
7	b:14	a	a,b:11-26	a,b:11-21	b:8-30
8	a	a, b, ab	a, b, ab	a, b, ab	a, ab
9	/	a?, b?, c?	a?, b?, c?	a	a, b, c
10	/	a	a	a	b, c
11	/	/	/	a, b	a, b

註：/表示該世紀不具有此項特色，x 則表示該世紀具有此項特色。

?表示該特色似為後世所加。

ab 表示 a 和 b 二項同時出現在一個寫本。

從這個統計表上我們看到一個明顯的現象：特色的出現大致呈現與時俱增的趨勢和前後承接的關係。而這樣的現象似乎又與佛教在中國的發展有某種程度的關連性。以下就中國佛教史料加以驗證。

真言——真言的傳譯雖始自漢，但密教之傳實起于唐玄宗(712-756)，並大宏于不空(704-770)，在唐大中年間(847-859)廣行于民間。<sup>12</sup>

據此檢驗核對我們的抽樣寫本，發現真言之出現在九世紀寫本的經文前後便屬當然。載有真言的九世紀敦煌寫本並不多，在我們的抽樣調查中，13份中只有2份載有真言。這二個寫本分別是：一、註記年代868、抄寫者王玠的寫本<sup>13</sup>；次為S.1846。前首我有淨口業真言於經文前及隨心真言於經文後<sup>14</sup>。後者於經文前載有相同的真言，經文後則為大身、隨心、心中三真言。相反地、載有真言的十世紀寫本的抽樣比例較九世紀高許多，22份中有17份載真言；13份載經文後的三真言。除了淨口業和這三真言外，在十世紀的寫本中我們還見到普供養真言(S.5646)，文殊菩薩真言(P.2094-2)及安土地真言(P.4516)。另外，強調誦咒功德的文字(P.2094-2，北4355)讓我們理解真言愈趨多樣化及出現頻

<sup>12</sup> 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北京：中華，1988，頁195。黃懺華，《佛教宗派源流》，台北：長春樹，1987，頁118。

<sup>13</sup> B.L.P. 2/Serindia，第四冊。

<sup>14</sup> 據平井侑慶，經文後為大身真言。但核對三份載有大身、隨心及心中三真言的寫本S.5534，S.5444，S.5451，此寫本經文後的真言與這三寫本載的隨心真言是吻合的。平井侑慶，《金剛般若經》，《敦煌中國佛教》，講座敦煌7，東京：大東，1984，頁17-34，尤其頁25。

繁的原因。

若上述推論無誤，則應質疑出現在七世紀寫本(S.6954)的真言，而以爲是出自後人附加的手筆。

八金剛與四菩薩——在抽樣寫本中八金剛與四菩薩並非一定同時出現，實際上我們常見到八金剛單獨出現，且在同時出現的場合總是八金剛在前四菩薩在後。

八金剛似爲一特定的組合，成員爲：青除災金剛、辟毒金剛、黃隨求金剛、白淨水金剛、赤聲火金剛、定持災金剛、紫賢金剛、大神金剛<sup>15</sup>。常見的四金剛組合成員爲金剛眷菩薩<sup>16</sup>、金剛索菩薩、金剛愛菩薩和金剛語菩薩，出現在九、十世紀之抽樣寫本中。另一組則只出現在一份七世紀的抽樣寫本中：S.6954，其組合爲：地藏菩薩、觀世音菩薩、普廣菩薩和金光藏菩薩。

明顯地，八金剛與四菩薩的出現和密教的傳播流行關係密切，換言之，其出現於敦煌寫本的時間似不應早於九世紀。故，我們質疑S.6954的四菩薩是後人附會加入的。

云何梵發願文——歷來傳說《金剛經》的云何梵爲武則天(執政期684-705)所作<sup>17</sup>，關於發願則似不曾有人追究其起源。而在我們的抽樣寫本中，云何梵始見於九世紀，發願文則始見於十世紀。

根據我們的考證，一、云何梵的內容與《大般涅槃經》壽命品和金剛身品極近似<sup>18</sup>。這部經有三譯，譯出年代分別是417-418，421，430。這足以說明，即使武則天與云何梵有所關連，她並不是云何梵的原創者。二、武氏利用佛教鞏固其政治勢力的事實眾人皆知，其爲諸經制序史亦不乏記載，何容獨云何梵爲當時人疏忽？若其欲藉《金剛經》這部已廣流通於民間的經典宣傳，則何以一個世紀之後才突然出現在民間寫本中？綜上，對於武氏爲云何梵作者之說，我們疑其真。但在道世(？-683)的時代云何梵已成爲禮贊文的一部分<sup>19</sup>；到了智昇(668-740)時代云何梵則爲禮懺文的一部分<sup>20</sup>。這顯示云何梵的流行與發願往生的

<sup>15</sup> 於S.5536和S.5581註記的是大神力金剛。

<sup>16</sup> 於S.1846爲金剛羅菩薩。

<sup>17</sup> 例如南懷瑾，《金剛經說什麼》，台北：老古，1993，頁14-15。

<sup>18</sup> 《大正藏》No.374-376，第12冊，頁379、619和863。

<sup>19</sup> 《大正藏》No.2122，第53冊，頁757。

<sup>20</sup> 《大正藏》No.1982，第47冊，頁464a。

淨土信仰關係密切。而查淨土往生之流行雖上溯初唐，然其昌盛天下似自八世紀末期<sup>21</sup>。

譯本版本——第六至第十世紀的抽樣寫本所載的譯文幾乎是清一色鳩摩羅什譯本，除了在第七世紀我們另外發現菩提支流(如 S.3210，S.3317，S.4008，S.4229)與玄奘(如 P.2323)的譯本。

截至第七世紀為止，《金剛經》已出現了五個漢譯版本；亦即、尙未見到譯於 703 年的義淨譯本。在五個譯本中，第三個版本，真諦譯，因政治動蕩不安以致未廣傳<sup>22</sup>；第四個版本，達摩笈多譯，因直譯難懂也未流通。玄奘本有當時朝廷勢力推廣<sup>23</sup>，流支本受益於《金剛經論》首譯之惠<sup>24</sup>，而與羅什本並傳於民間；然羅什本因譯筆中肯平易，早得民心，故始終一枝獨秀地爲人廣傳。

分科——有 12 和 32 之別。12 分科見於七世紀流支版的抽樣寫本 ( S.3210 )，32 分科則見於九 ( S.1846 ) 與十 ( P.2094-1，P.2876，P.4514-4516，S.5444，S.5451，S.5534 … ) 世紀羅什版的抽樣寫本。

12 分科的蹤跡似以天台智頤 ( 531-597 ) 的《金剛經疏》(大正藏 No.1698) 爲最早見，次爲三論吉藏 ( 547-622 ) 疏 (大正藏 No.1699) 。而從這二經疏我們了解到：一、在核對過流支譯《金剛經論》三卷後，由於證據未充分，我們認爲 12 分科爲流支所分或首見於流支譯世親經論不足信；二、約在七世紀 12 分科通行並引起負面的批評。後者或許能作爲說明未見分科於八世紀寫本的理由。

32 分科世傳昭明太子 ( 501-531 ) 所爲，但不見任何舉證。而我們卻發現二點足爲反證的現象。首先、若 32 分科是昭明所爲，何以智頤和吉藏在其經疏中論到分科時皆未提及？尤其當吉藏批評 12 分科之破碎經義時，何能視若無睹所分更瑣碎的 32 分科？又，若 12 分科於七世紀已爲人接受而流傳，則出自享有文名之王室貴族手筆的 32 分科何以竟遭人漠視至九世紀方見於流傳的寫本中？

<sup>21</sup> 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頁 192-194。

<sup>22</sup>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北京：中華，1983，頁 615-616。真諦版寫本雖見於敦煌寫本中，但爲數不多。

<sup>23</sup> 《大正藏》No.1700，第 33 冊，頁 125；No.1816，第 40 冊，頁 730。

<sup>24</sup> 流支《金剛經》譯本實由其所譯的漢譯第一譯《金剛經論》節錄出，且讀六、七世紀的智頤和吉藏的《金剛經疏》，當時流支譯的該經論似較該經本更爲人重視。參《大正藏》No.1698-1699，第 33 冊。

其二、根據《大唐西域記》，翻「須菩提」為「善現」始於唐代<sup>25</sup>。而在六漢譯本中唯玄奘翻「須菩提」為「善現」。若 32 分科於唐代以前即存在，何以第二科科名為「善現啓請」，而不是「須菩提啓請」？據此，我們現在所見到的 32 分科，若其不曾遭修改，則其成立與流通應較 12 分科晚許多；甚至晚在玄奘譯本之後。而這樣的推論與佛典漢譯的發展和寫本所呈現的現象才符合。

加冥司偈六十字補遺段——這段文字的補遺都是出現在十世紀的載有 32 分科的羅什版的抽樣寫本中，如 S.5444（905），S.5451（906），S.6727（926），P.3398-1（943）。雖然窺基（632-682）早就指出此缺漏<sup>26</sup>，但似乎是伴隨著靈幽法師長慶二年（822）的《還魂記》的流傳與信仰<sup>27</sup>，這段節錄自流支譯本實際應為 62 字的段落才理所然地嵌在羅什的譯本中。

行文格式——在敦煌寫本中我們發現一個現象，那就是七世紀宮廷專司所為之寫本則幾乎皆以每行 17 字的格式行文。日人有一說以為五世紀末此格式已正式成為漢文寫經格式<sup>28</sup>。若其意欲指此格式於五世紀末已成為官方認定唯一通令普行的格式，則此格式應可作為寫本斷代參考。然、核以史料，並未見到足為此謂之憑據。故、揣測日人之意似指、於五世紀末這個行文格式已被應用在漢文寫經而未遭排斥。因為，除了金剛經之外，從五世紀以後的其他敦煌寫經我們不難見到多樣的行文格式，甚至出現在官方寫本中<sup>29</sup>。所以我們只能說每行 17 字的行文格式於五世紀被應用於漢文寫經；且是七世紀官方習用的寫經格式，但對漢文寫經而言，這既非唯一的標準也不是固定的格式。在金剛經的抽樣寫本中，這個工整嚴謹的行文格式出現隨著政治動蕩逐漸遞減，到了十世紀便幾乎完全消失。

<sup>25</sup> 《大正藏》No.2087，第 51 冊，第 5 卷，頁 893b。

<sup>26</sup> 《大正藏》No.1700，第 33 冊，頁 149；《續藏經》1-39-2，頁 163。

<sup>27</sup> 《大正藏》No.2061，第 50 冊，頁 869；P.2133。又，方廣錫先生的研究指出此 62 字段的補入出現在是「唐以後」；但方先生疏忽了在他用來研究的注記年代唐咸通九年王玠為其雙親刻寫的這個寫本已經載有這 62 字的補遺了。參見方廣錫《敦煌文獻中的金剛經及其注疏》，《世界宗教研究》第一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世界宗教研究所，1995，頁 73-80。

<sup>28</sup> 中村元，笠原一男，金岡秀友，《アジア佛教史-中國篇》，ツルクロ-ト宗教，東京：佼成，1975，404 頁，頁 201-276。

<sup>29</sup> 方廣錫，《佛教大藏經史-八~十一世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1991，518 頁，頁 61-64。



「世」字避諱——「世」字本是為避唐太宗李世民（執政期 627-650）之諱，但從抽樣寫本我們明顯地看到即使在七世紀時這個避諱並未被嚴格執行；這印證李唐一家習於胡俗不避父諱的史實<sup>30</sup>。又、於六世紀的抽樣寫本中已見存這個避諱的字體，故、對以此避諱字體作為寫本完成於唐太宗世以後的斷代指標應再加斟酌。

題跋——註記「校閱」之題跋的抽樣寫本年代從七世紀持續至九世紀，而從第十世紀起，即相當於從歸義軍佔領期開始，「校閱」這帶有官方色彩的題跋便由含著民間色彩的「西川過家真印本」及八十餘歲老人記所取代。

寫本形式——在大量的手抄卷軸式寫本之外，本子或冊子及木版印刷本的出現始於九世紀。但由於後者的珍貴不易得，它只佔了敦煌寫本的一小部分。換言之，即便在本子或冊子及印刷本出現後，傳統手抄的卷軸式寫本仍舊是寫本的主要形式。

### 三、金剛經敦煌寫本特色的斷代功能試探

綜合上述金剛經寫本各特色的時代個性，且據之，於同經大量年代不明的寫本中取其同具備這些特色者若干試作初步的斷代分類：

或成於第七世紀之寫本——北 散 0029，北 3597，北 4085，北 4429-4433。

或成於第八世紀之寫本——北 4435-4436。

或成於第八世紀以後之寫本——北 3500，北 3502-3503，北 3509，北 3515，北 3519，北 3555，北 3608，北 3661，北 3901，北 3950，北 4150，北 4266，北 4390；S.3062，S.3972，S.4886，S.5445，S.5450，S.5545-1，S.5581，S.5585，S.5699，S.5911；P.2265，P.2756；Д DX.2060，Д DX.138，Д DX.25201，Д DX.2531，Д DX.120。

### 四、結論

配合佛教史、通過金剛經寫本特色的時代個性研究，有以下價值：

1. 驗證寫本特色出現時代的真偽，如出現於七世紀寫本（S.6954）中的真言及八金剛四菩薩即屬偽。

2. 驗證佛史傳說的真偽，如 32 分科出於昭明太子，云何梵出於武則天的傳說皆不可信。

---

<sup>30</sup> 陳寅恪，《陳寅恪讀書札記—舊唐書新唐書之部》，上海：古籍，1989，頁 1。

3. 驗證其他斷代參考的適用性，如「世」的避諱字體於此經寫本斷代的適用性較弱。

4. 提供同經寫本斷代的參考憑據，如我們的初步試探。

敦煌學研究中心

---

# 敦煌學研究中心

---

敦煌學 第二十一輯

編輯者：敦煌學會

出版者：敦煌學會

通訊處：嘉義民雄郵政二之五六信箱

總經理：樂學書局有限公司

台北市金山南路二段一三八號十樓之一

電話：三二一九〇三三

傳真：三五六八〇六八

定價：新臺幣三八〇元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出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